

唐宋八大家全集



唐宋八大家全集

余冠英 周振甫
启 功 傅璇琮

主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全集/余冠英等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10

ISBN 7-80105-478-4

I. 唐… II. 余…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唐代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宋代 IV. 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96)第 14556 号

责任编辑:陈杰平 王福荣

责任校对:洪思律 赵明

唐宋八大家全集(全三册)

余冠英 周振甫 主编
启功 傅璇琮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发行部电话:64010840、64010837

新华书店经销

辽宁金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94.5 印张 700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05-478-4/G·30

定价:495.00 元

《唐宋八大家全集》编委会

主 编 余冠英 周振甫 启 功 傅璇琮

副 主 编 仇正伟 李肇翔 金 锋 孙以年

特邀编审 冯惠民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仇正伟	王宏治	叶爱民	冯惠民
孙以年	朱振华	启 功	余冠英
余 喆	张文强	李 克	李 岩
李肇翔	周振甫	金 锋	杨梦东
赵又新	赵 东	胡宝国	贺照田
钱 华	柴剑虹	曹月堂	崔高维
舒 炜	谢俊峰	傅璇琮	

前言

傅璇琮

“唐宋八大家”一词，最初是明朝人提出来的，而明人提出“唐宋八大家”，则主要着眼于文章。实际上，八大家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不限于文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其诗歌创作，无论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在中国诗史上都有他人所不能代替的特色；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更是词的大家，在两宋词坛上，都能独树一帜。因此我们今天来评论和研究唐宋八大家，不能拘限于明人的见地和所定的范围，应当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出发，对这八位大作家的作品给以全面的历史的把握。

应当说，唐宋八大家是不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看待的。韩愈和柳宗元，同处于中唐时期，在他们面前，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是相同的，他们共同倡导后来所谓的古文运动，但韩、柳二人无论散文或诗歌，风格是极不相同的，文学主张也有所差异。欧阳修自己说是继承韩愈的文学革新主张，但他的创作实践与韩愈也有所不同，而正因为他所倡导的条达舒畅、委婉闲易的风格，就开创了有宋一代诗文不同于唐代的崭然独立的面貌。王安石、曾巩、三苏，更其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有大历诗风、元白体，宋代有江西、江湖诗派，但不能说在古代诗、文的流派中有一个“唐宋八大家”。我们应当承认这八大家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各有其独特的文学成就，唯其如此，他们才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形成“重镇”，他们的总体成就，是可与“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传统文化瑰宝相并比的。这也是我们把这八大家的文学作品尽可能搜辑齐全、编纂成全集的主要动因。

编纂唐宋八大家全集，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今天的读者能直接接触和阅读古代文学原作。我们今天无论是想欣赏古代佳作，还是想作一些研究，最重要的是应该多读作品，而且应尽可能了解作家作品的全貌。选集是需要的，但选本终究不能代替全集，读选本与读全集，人们的感受就是不一样。杜甫咏泰山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想，读过全集的人，当会有杜甫的这种感受。这应当也是一种读书乐趣与文化追求。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几位搞古籍整理的中青年学者，于1994年秋向文学史界老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先生提出编纂唐宋八大家全集的设想。令人感到惊喜的是，长期卧病在床的余先生十分赞赏这一设想，并且欣然同意担任全书的主编。这一项目也得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支持，他们极愿合作，并且

纳入该社精品图书规划,尽快把这套大书编印出来。

余冠英先生的首肯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支持,自然是对这项工作的极大鼓励,但实际工作做起来,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着重提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要求,为实现这一任务,在具体实践中,就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我们体会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决议》所说的“重视出版传统文化精品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应该说是传统文化精品,我们应该谨严从事,掌握古籍整理的基本知识和手段,使这一全集同时成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工作应有一个通盘计划,首先是人力安排和整理方案。在人力方面,我们力求依靠专业力量,参加编辑、校勘、标点的,都应当是有过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且视古籍整理为学术事业因而能专心来做的。这次参加的编纂、整理者,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图书馆、中华书局。我们认为,从这些单位来考虑参与者,整体的文化素质与工作能力是可以信任的。

整理方案则有好几个方面。首先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底本。这方面是颇费斟酌的。唐宋八大家固然是名家,但历史上关于他们的全集整理却极少,过去往往是诗、文、词分别刻印的。此次我们要求整理者一定要考查并理清版本源流,掌握已有成果,在此基础上确定底本与参校本。近十几年来文学古籍整理研究有较大进展,如《全宋诗》、《全宋文》以及《全唐诗补编》等具高水平的著作,都应及时利用,吸取有益成果。现在各集均有辑佚,能基本反映出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各集之后还附有作家传记资料、作品评论资料,这些都可省却读者跑图书馆的翻检之劳,对教学者和研究者都提供方便的条件。

这里应有两点需要交代:一是全书采用简体、横排,二是在校勘上采取有校改而不出校记的方式。后一点,具体说来就是:在用参校本校底本时,凡遇有文字不同的,采取校是非不校异同的原则,即文字两通的,不管文义如何,一律即据底本,不加改动;凡属底本中的衍文、错讹文字,均加圆括号(),并排六号字以示区别,凡据他本添加及改正的文字,则用方括号〔 〕表示。

按过去的古籍整理常规来说,全集的点校本是应当用繁体字的,而且以竖排为好,同时在校勘时,遇有校改即应出校勘记。我们认为,这一原则是对的,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资料性较强的古籍著作,一定要这样做。但古籍整理也应随客观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我们应当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古籍为现实服务,更贴近现代生活与创作,这就要考虑尽可能用现代人所习惯的形式使文学古籍更好地走向大众。繁体、简体,只是一种印刻形式,繁体能较多地保持古籍原貌,当然应该肯定,但现在广大读者确已习惯于简体字,繁体字在没有注释的情况下会造成阅读上的

一定困难,我们为什么不可在保证文字无误、校勘准确的情况下采取今天读者易于接受的简体、横排的方式呢?消除阅读上的障碍,当能加深理解和增强鉴赏的乐趣。

过去古籍整理图书,有校改而未有校记,也有先例,如五十年代出版的新标点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出版)即是如此。《通鉴》这样做,出版后也得到研究者与一般读者的认可。特别是考虑到这套《唐宋八大家全集》主要还是面向广大读者群,假如详出校勘记,则读者可能会感到不胜其烦。我们的目的是想帮助读者直接阅读原文,以便真正理解和欣赏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不必分心去扣读校记。只要保证确是经过细心的版本校勘,在择定正误上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那末这就可以作为一个阅读定本提供给今天的读者,这样做当是利而无弊的。

最后还应说明的是,余冠英先生于1994年秋本是想为这套全集本写一总序的,但余先生过不多久不幸去世,后即由周振甫先生撰写全书的导论,对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成就作了全面的阐述。启功先生作为主编之一一直十分关心整理、出版情况,叮嘱一定要细心谨慎,注意质量,并特地为全书题签书名。李肇翔、仇正伟、金锋同志在组织人力、审阅书稿中做了不少具体工作。特别是仇正伟同志,他在拟定整理方案、约集整理者的前期工程中多有通盘考虑,在后期的审稿加工中更是细心负责,字斟句酌。冯惠民同志在确定全书体例方面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并作为特约编审,认真审阅了部分书稿。这好几百万字的大书能在短短几年内整理出版,洵属不易,我们应提倡这种勤奋奉献的精神。当然,书中难免有不当、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六年十月

导 论

周 振 甫

唐宋八大家定名与背景

《四库全书总目》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称：“《明史·文苑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按《文编》所选，自周迄宋，不限于唐宋。其所选唐宋文，虽限于八家，而无“唐宋八大家”之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实本于《文编》所选八家，而“唐宋八大家”之名，则为茅坤所定。《文编》所选唐宋八家，又当推本于明初朱右所选之《八先生文集》。《八先生文集》虽不传，但明贝琼有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序》，称“六家”，以“蜀苏氏父子”三家为一，实即八家。贝琼序称朱右之选：“降于六朝之浮华，不论也。昌黎韩子倡于唐，而河东柳氏次之。五季之败腐，不论也。庐陵欧阳子倡于宋，而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及蜀苏氏父子次之。”是朱右所选，以唐代韩愈起来反对六朝浮华的文风，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和之，因选韩柳两家。以五代文风败腐，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曾、王、三苏和之，因选宋代六家文。唐顺之选《文编》，自周迄宋，于唐宋两代取于朱右所选之八家，以上窥秦汉。《四库全书总目》于《文编》称：“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自正、嘉（正德、嘉靖）之后，北地、信阳（李梦阳、何景明）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王世贞、李攀龙）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是唐顺之的《文编》以唐宋八家，上继秦汉，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摹仿秦汉文的字汇句法。朱右（？——1376）字伯贤，明初临海（在浙江）人。明朝征右编《元史》，史成归里。又征右编《日历》、《宝训》，授翰林编修，迁晋府长史。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明武进人。官至右佾都御史，巡抚淮扬。工古文，人称荆川先生，著有《荆川先生文集》。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明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官至大名兵备副使，著有《白华楼藏稿》等书。

朱右选唐宋八家，有见于唐代的韩柳两家，反对六代的浮华而发动古文运动来的；宋代的欧阳、曾、王、三苏六家，反对五代的腐恶，发动古文革新运动来的，是

有所见的。唐顺之选唐宋八家,是有见于八家之文,有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可以上继秦汉,以救明代复古派之弊。茅坤选唐宋八家,所得较浅,欲从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以求八家之法,不免落入学唐宋文的窠臼。

再看唐代韩、柳两家,《新唐书·文艺传》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始则唐高祖、太宗“沿江左余风,缔句绘章,故王、杨(王勃、杨炯)为之伯”。次则“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张说、苏颋)擅其宗”。三则“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遂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轶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这就是韩愈倡导,柳宗元和之的唐代古文运动。

从东汉末年,经过魏晋六朝到初唐,骈文盛极一时。骈文讲究形式,讲对偶、声律、辞藻,它的流弊忽视内容,构成一种形式主义文风。韩愈起来倡导古文运动,即用唐代文辞仿古代的散文写法,称为古文。反对骈文,用古文来代替骈文,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创作成功的古文作范例,一要提出创作古文的理论来使人信服。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这就是唐代的古文两大家。从唐末经过五代到宋初,骈文又兴盛起来,到宋初的杨亿,提倡西昆体,用骈文来作文,盛极一时,石介起来反对杨亿,又兴起一种怪异的文风。欧阳修起来倡导古文革新运动,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轼、辙和之。他们的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的理论,也获得大成功,成为宋代的六大家。唐代两大家和宋代六大家合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的成功,依靠古文创作和创作古文理论的成功。先看唐代韩愈、柳宗元在这两方面的成就。

韩柳在创作古文上的成就

《旧唐书·韩愈传》称他创作的古文为“经诰之指归,迁、雄之品格。”经诰指儒家的经书,即用儒家的理论来写古文,又推重他的古文,说有司马迁、扬雄的气势格调。韩愈的学生李汉,替韩愈的文集写序,称韩愈的文章:“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惻当世,遂大拯颓风。”“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赞美他的古文,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与日月争光,与宝玉比洁。他的古文,还写出了各种形态。在反对骈文上,具有摧陷廓清的功效。宋代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赞他的古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即指从东汉到隋的八代中骈文极盛,思想上异端并起,包括佛、道思想盛行。称“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指韩愈提倡古文,倡导儒家思想,作《原道》来排斥佛老,称为“道济天下之溺”。

宋苏洵《上欧阳内翰(修)书》，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遇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这里指出韩愈文的风格特点，也说明韩文的杰出成就。

宋林光朝《读韩柳苏黄集》论韩愈诗：“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化百出，可喜可愕也。”赞美韩愈的诗，也像韩愈的文章，有大力奔放的，有藏形匿影的，变化无穷。

再看柳宗元的创作，韩愈称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又在《柳子厚墓志铭》称柳宗元的文章：“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家，卓厉风发。”如《封建论》。又称他贬为永州司马时：“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划山水，有杰出成就。柳宗元的寓言小品，如《黔之驴》等，形象生动，含意深刻；他的《段太尉逸事状》，工于塑造人物。在文章的各种体裁上，也作出突出贡献。柳宗元的诗语言峻洁，情意幽深，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评他的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有骚人之韵。

韩柳的文论

韩愈在《进学解》中，除推重经书外，称“下逮《庄》《骚》，太史所录。”于诸子中推《庄子》，于史部中推《史记》。他的认识，有超过刘勰处。因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不突出《庄子》，于《史传》中不突出《史记》。韩愈之识见，也超过刘知几，因刘知几在《史通》中尊《汉书》而抑《史记》。

韩愈的文论，有《答李翱书》，提出学道与养气说。

他讲学道为文：“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光明）。仁义之人，其言藹如（状美盛）也。”指学到儒家之道，成为仁义之人，其文自然美好。

讲学道为文的进程：“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状端庄）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然后识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这里讲学道，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求之乎读书之源”，即从诗书的书本上学道，学成为仁义之人，才能写好古文。

再看养气。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说明古文与骈文不同，骈文

要讲声律,调平仄;古文讲气势旺盛,所以要养气。

韩愈讲古文,先要学道,学习儒家讲的道理。所以他在《答刘正夫书》里说:“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效法古代的圣人贤人,学习他们讲的道理,不学习他们的文辞。因为古代的圣人贤人写的文辞,跟唐代的文辞不完全一样,所以不学习古代的文辞。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在《答尉迟生书》里说:“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爱之异也。”古道有两方面,一方面对唐朝还适用,一方面适应古代的需要,对唐朝已不适用。他在《读仪礼》里说:“考于今,诚无所用之。”所以他在《原道》里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他讲儒家的道理,就讲合乎仁义的道理。道家佛家讲的,不合乎儒家仁义的道理,他要起来反对,这就是他写的《原道》。儒家之外,别的诸子百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对唐朝有用的,他也讲。儒家讲的道理,他认为已经过时的,他不讲。他在《读鹖冠子》里说:“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鹖冠子》是道家,不同于儒家,他却赞美它。他在《读墨子》里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那他讲的古道,也包括墨子之道。但他对于儒家的《仪礼》,却认为已经过时,没有用了。这说明他的学古道,还是比较通达的。但是他的学古道,不论是主要学儒家的道,或学诸子百家的道,都是从书本中学。但柳宗元的学道,就跟他不完全相同了。

再看柳宗元的文论。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里说:“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为比兴之不足,恢拓之远,钻研之不工,颇赜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甚明、黜其宝哉!……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这是说,文章难以写好,不是因为比兴不足,开拓不广,钻研不深,毛病不去,而是得到道为难。得到道,文章即使有缺点,也像日月的有日蚀月蚀,宝玉上的有斑点,还是日月,还是宝玉,那能伤害它的光明,废黜它是宝玉呢?主要是对道的认识,对道有明显的认识,或不明显,这跟幸或不幸有关,跟辩明或说不明有关,跟文章上升或下降有关,跟观察的正确或不正确有关,跟人家的爱好或厌恶有关,跟交接的广阔或狭隘有关,跟文章屈辱或申展有关。那些自以为得道奋笔写作的,得呢不得呢?还不可知。这是说,对文章的题目作了研究,有了认识,即使文章有毛病,还是日月之蚀,宝玉之瑕,还是好的。对文章的题目,没有研究,没有认识,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不幸的,说不清楚的,不好的,不正确的,被人讨厌的,看得不广的,屈辱的。他讲的得道,就是对文章的题目,有研究,有正确认识。这个道不是圣人的仁义之道,是这个题目的道理,这是他与韩愈的不同处。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里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

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这是说,当时讲道理的有三种:一种是儒家,讲得迂腐迷蒙而不合,一种是切于事实,又讲得苛刻而不合理;一种是好怪而妄言,不可信赖。

再看他的所谓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里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之,道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以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这是“取道于内”;一种是“贵辞而矜书”,“不亦外乎”。他认为要取道,要“及乎物”,这叫“取道之内”,就是要从事物本身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内”;从书本上去求道,这是“取道之外”。怎么分别取道之内与取道之外呢?可用柳宗元的《天说》来看:

韩愈谓柳子曰:“……吾意有能残斯人(民)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韩愈从书本上去求道,书本上认为天是赏功而罚祸的,因此认为人民垦原田,伐山林,疏沟洫,祸元气阴阳,当受天罚;残害人民的,是减少对元气阴阳的祸害,是有功于天地,当受天赏。柳宗元的求道,“及于物”,即及于天地、元气、阴阳,看到这些物,不会报,也不会怒,不会赏功罚祸。人民垦原田,有收获,有功,功者自功。人民伐山林,有祸,祸者自祸。功和祸,都是人民自造的,欲望天的赏罚者大谬。这是柳宗元求道及于物,是求道之内,胜过韩愈从书本求道之外。

柳宗元的论文求道也与韩愈不同。韩愈论文求道,要学为圣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还是“及于物”。当时认为《五经》与诸子、《离骚》、《史记》等写得最好,就从些书中求写作之道。他在《与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提出从《五经》里“取道之原”: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柳宗元的论文求道,认为《五经》中保留写作所求的道,如文章的内容要求质实,说的道理要求持久,要求适宜,要求有决断,要求有变化。在这些方面从《五经》中去求,这是论文求道之原。

光有了这些认识还不够,还需要端正态度,“羽翼乎道”:

故吾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

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这里讲，作文在得到道以后，写文章来说明道，要端正态度。未敢掉以轻心，怕文章写得浮滑而不庄重；未敢出以怠慢，怕文章写得松弛而不严谨；未敢出以昏沉，怕文章写得昏暗而杂乱；未敢出以骄气，怕文章写得高傲而骄横。对文章的内容，抑制它使它深入，发扬它使它鲜明，疏通它使它通畅，简练它使它有节制，激发它使它清新，固定它使它庄重，就可以用来扶助所讲的道。柳宗元又说：

参之《谷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最后还要参考各家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如参考《谷梁传》来使文气严谨，因为《谷梁传》在解释《春秋》时最为严谨。参考《孟子》《荀子》，使文章的枝叶茂盛，因为孟子、荀子善于设喻，使文章枝叶茂盛。参考《庄子》《老子》，使文章的开端显得恣肆，《庄子》文章设想奇特，开端恣肆，《老子》比较谨严，在这里可能借作陪衬。参考《国语》来丰富文章的趣味，参考《离骚》使文章意味幽远，参考《史记》来使文章洁净。这是从旁推求，参考这些作品来加强文章的艺术性。

韩愈、柳宗元的文论，都讲求道，韩愈主张从书中求道，柳宗元主张从“及于物”中求道，在这一点上，柳宗元的求道胜过韩愈。柳宗元怎样从“及于物”中求道呢？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里说：“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他写段太尉逸事，就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了解段太尉的故老卒吏，得到了详尽的材料，再请求了解段太尉的永州刺史崔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参校，从而认识段太尉的性格德行。从段太尉一生的行事和言论中去认识他，这就是“及于物”的取道之内。“及于物”即及于人物。韩愈虽然主张从书中求道，但他在写《张中丞传后叙》时，“得李翰所为《张巡传》”，但他不相信那篇传，加以批评，是他不完全相信书。却说：“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韩愈亲到张巡、许远的双庙里去祭奠，亲自听老人讲张巡、许远时事，所以文中补写南霁云的事，极为生动感人。又从张巡手下的于嵩，得知张巡的事。那末韩愈写这篇文章，也像柳宗元一样，是“及于物”的，所以写得极为生动形象，和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一样传诵。

宋六大家的诗文

宋代六大家中，以欧阳修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宋史》本传称：“曾巩、王

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为必显于世。”“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此则就大体说。苏洵《上欧阳内翰书》，称他的文章风格：“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又称“陆贽之文，遣言措辞，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钱钟书《宋诗选注》称修：“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在诗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宋元十家词选例言》：“其词与元献（晏殊）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曾巩，《宋史》本传云：“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钱钟书《宋诗选注》：“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王安石，《宋史》本传称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修有诗赠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用李白、韩愈来推许他。他《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不以文学家自许。钱钟书《宋诗选注》称王安石诗“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辞的技巧。”“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突出他的修辞手法。

三苏的诗文创作，《宋史》论三苏文，于《苏洵传》称“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特于《苏轼传》称：“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于《苏辙传》称：“苏辙论事精研，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至论轼英迈之气，宏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钱钟书《宋诗选注》论轼诗，称：“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由活泼，可是同时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词，宋人胡寅《题酒边词》：“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视，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永）为舆台矣。”极推苏词风格为高。

宋六大家的文论

唐代韩、柳的文论，突出地讲学道；宋六大家的文论，突出地讲文学的艺术性。

欧阳修的文论,在《答吴充秀才书》里,虽说了“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继承唐朝人求道的用意,但他的突出的文论,还在讲文的艺术性。他在《书梅圣俞稿后》说:……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刚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声,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也。然至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

欧阳修在这里提出音乐和诗歌所产生的令人心动神移,或歌或泣的感动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接触到艺术感染力了。

再看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按史家的文章以叙事为主,而曾巩要求史文叙事中写人,在写人时要写人“难知之意”,发人“难显之情”,司马迁的《史记》就在叙事中写人的“难知之意”与“难显之情”,成为传记文学的杰作。这样的要求,即要求史文写成传记的文学,而有文学的艺术性。

王安石的文论,有《上人书》,引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称为“作文之本意”。则要求作文的内容,有自得、居安而资深,则非同泛泛,必深有所得,必有深切体会,如欧阳修所云的感染力。又称作文之辞,比之于“刻镂绘画”,亦以艺术作比,则对作文的要求,亦通于艺术。

三苏的文论,苏洵有《仲兄字文甫说》,以为风水相遭而文生焉。释者以水喻艺术修养,风喻创作冲动。那风水相遭的比喻,也比作艺术修养了。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论孟子、韩愈、欧阳修三家文,皆推究三家文的不同风格,亦视艺术性立论。那苏洵的文论,亦强调艺术性。苏轼的文论,有《答谢民师书》,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那末怎样“求物之妙”呢?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里称司空图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计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那苏轼讲的“求物之妙”,即求盐梅在咸酸之外的美,即求诗文的艺术美。苏辙的文论,有《上枢密韩太尉书》,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提出从外境阅历来培养

奇气。他讲司马迁的文章疏荡,颇有奇气,还是就文的艺术性说的。这样看来,宋代六大家的文论,与唐代韩、柳的文论不同。唐代韩、柳的文论重在求道,而宋代六大家的文论重在探讨诗文的艺术美。但柳宗元的文论,参考各家的作品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章的艺术性,宋代六大家的文论,就从他这里作了发展,把重点探讨到诗文的艺术性了。

唐宋古文风格的差异

清人刘开《与阮芸台(元)宫保论文书》,称:“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陈出新,微引波澜,铿锵鏗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按韩愈在《进学解》里讲:“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又称:“子云(扬雄)、相如(司马相如),同工异曲。”刘开讲韩愈的为文是有据的,不过他的尊唐贬宋则因阮元主张骈文,不免有意迎合,是不确的。不如明末黄宗羲《南雷庚戌集自序》中说得平实。他说:“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变: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盖划然如界限矣。”按韩愈的文章,本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怪怪奇奇,一方面是文从字顺。欧阳修发挥他的文从字顺这一面,是好的。韩愈“气盛言实”,所以他的文章,气势旺盛,或不足于理。欧阳修的古文委曲详尽,以理胜。如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草木有什么不得其平呢?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诸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婉转申说,皆中于理。又如记山水,唐文由穷极形象,而感慨身世;宋文则歌颂人物,或写诗情画意之美。如柳宗元《小石潭记》,称潭水之清,则曰鱼“皆若空游无所依”。称泉水曲折,则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归结到“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与作者贬谪的身世相应。欧阳修写《岷山亭记》,于“山川之胜势”,令“览者自得之”,皆不道,只推美晋将羊祜。又如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不谈寺容,只写:“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先用一“如”字,先写比喻,有诗情画意,后指竹柏影。亦见宋文重在写艺术性,与唐文的刻划形象不同。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称：“韩柳犹用奇重字。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如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作“水泚泚循除鸣”，泚(GUO 国)，状水声，即奇重字。而欧阳修《醉翁亭记》作“渐闻水声潺潺”，即用平常字。又如柳宗元《小石潭记》：“卷石底以出”，卷音拳，本于《礼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犹还也。”《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注：“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卷为一斗六升容量。此即奇重字。苏轼《石钟山记》：“有大石当中流。”用“大”即平常字。但如《醉翁亭记》，陈师道《后山诗话》称“少游(秦观)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赋是铺叙，《醉翁亭记》写山水景物，用“者”字铺叙，用“也”字点明，如“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用赋体写记，是记文的创格。苏轼的《石钟山记》，工于状物，如：“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皆为妙文。是宋文抛弃韩文奇奇怪怪的一面，有取于他的文从字顺的一面，用平易自然的语言，创为精工形象的文辞，是宋文的杰出成就。

欧阳修、苏轼还用明白自然的语言来写四六文，唐代的骈文发展为四六文，讲对偶，多用典。欧阳修、苏轼用明白自然的语言来写四六文，成为四六文的创格。如欧阳修的《谢致仕表》：“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才，早逢休明之运。不通文学，既泥古以难施；无用之才，复虚言而少实。”苏轼的《密州谢上表》：“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既少用典或不用典，又限于四字六字句，实亦宋文的创格。这些说明宋文与唐文的差异，实亦宋文继唐文有所发展，可以供研讨的。